

首贴耳,亦步亦趋,唯唯诺诺,这些人只能消极地适应社会的需要,并因此只能保证社会的简单延续。

正是由于摆正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素质教育才成为一种真正的教育,这种教育以发展人为根本宗旨和神圣使命,这也正是教育的个性所在及教育的独立价值取向,教育的其他所有价值和功能都以此为基点,教育因此而成为左右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

而应试教育由于颠倒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使教育丧失了个性,偏离了自己的基本的价值取向,为眼前的、短暂的社会价值取向所左右,教育一忽儿是政治的附庸,一忽儿是经济的附庸,搞得无所适从,教育因此而变得力不从心而自卑。它片面地强调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分数也就因此排除了除知识以外的其他一切人类价值。不仅如此,分数还被当作一种外在的绝对尺度与受教育者的知识能力建立了正比关系,从而获得了脱离教育过程和性质之外的巨大的社会意义,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给整个教育

带来灾难。想想,母亲由于孩子分数不高而将他打死,儿子由于分数未达到父母的要求而杀死他们的父母,分数由于被赋予了巨大的社会(经济)价值所带来的灾难不就昭然若揭了吗?在应试教育中,考试和分数被异化为与教育相对立的魔杖。所以,就学校教育而言,一切与考试无关的活动,哪怕它对学生的的发展多有裨益,也遭到摒弃,考试已背离了自己的目的,成为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把教育引向一条狭窄的死胡同。就学生学习而言,学习等同于赶考,赶考赶走了时间,赶走了健康,赶走了有意义绚烂多姿的生动活泼的青少年时代,赶走了对父母的关怀,赶走了对民族人类的责任,剩下的只有干巴巴的分数,人被分数剥夺得多么贫困!

总之,在应试教育中,人,不见了;人作为教育的对象和主体,被遗忘干净了;人的潜能、个性、价值本来是高于一切的,在这里也都化为乌有了。

(作者单位:福建师大教育系、福建省教研室)

应试教育形成的社会条件及其治理

杨广云(博士 讲师)

科举制是一种典型的应试教育,它之所以能形成长达1300年之久的超稳定的“应试教育”机制,是因为这种机制生长在非常适宜的社会土壤中,也就是说,这种机制有着支持它的社会条件系统——即社会的水平流动机会极小;社会向上流动(升迁)的压力很大;向上流动的途径单一;社会选拔的标准贫乏;社会所提供的升迁机会极小。

现在我们简单分析科举制——古代“应试教育”机制的社会支持系统。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基本上被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极少有可能性进行职业的转换和地域的流动,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也极力限制臣民的这种水平的自由流动。但是统治者却开辟了科举制这一窄小的途径主要给被统治阶级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但是社会

上愿意向上流动的人太多了,而流动的途径和选拔的标准只有科举(主要为宋、明、清),且由于社会所需官吏的数量是一个很小的常数,于是便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这就是古代“应试教育”的社会支持条件系统。

下面我们试以上述“应试教育”的若干社会支持因素来讨论中国80年代和90年代的“应试教育”思潮。

自从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大反“应试教育”的运动,特别是经国家领导人呼吁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之后,社会上对“应试教育”更是口诛笔伐。“应试教育”果如所言危害那么大,而且越来越大吗?我们认为,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应试教育”之风最甚,而80年代中期以

来至90年代,也正是在大批“应试教育”的时期,“应试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却在持续地削弱,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左右着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们试以统计数字说明之(见表1):

表(1)我国高级中学学生数构成:单位(万人)

年份	合计	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技术中学
1980	1196.0	969.8	226.4
1985	1156.7	741.1	415.6
1990	1322.0	717.3	604.7
1995	1652.5	713.2	939.3
1996	1776.3	769.2	1007.1
比重(%)			
1980	100.0	81.1	18.9
1985	100.0	64.1	35.9
1990	100.0	54.3	45.7
1995	100.0	43.2	56.8
1996	100.0	43.3	56.7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1996年)》
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1997年1月。

从表(1)可看出,1980年普通高中的学生数占高中生总数的81.1%,反映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高中结构未调整的情况,当时初中毕业生不能得到有效分流,因而“应试教育”特别明显。80年代中期以来,普通高中学生数已从1985年的64.1%逐步降至1996年的43.3%;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则从1985年的35.9%升至1996年的56.7%。高中结构的根本改变提供了初中毕业生的分流渠道,有力地缓解了高中毕业生升大学的压力,这就大大削弱了“应试教育”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

另外,1977年至1984年间,全国高中毕业生总数4715万,而高校招生总数有269万,录取率仅为6%。^⑨高校招生数如此之小,且当时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又未受到就业前的职业训练,于是只好把自己绑在升学的战车上,相当数量的高中成为大学的预备学校。现在我们再来看看1996年高校招生数与普通高中毕业数之比。据统计,1996年全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本专科招生数分别是

96.58万人和94.52万人,两者合计为191.10万人,而当年普通高中毕业生数为204.93万人,^⑩高中毕业生数与高校招生数几乎达到1:1,这里还未包括私立高校的招生数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参加者。况且,近年来,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升入对口的大专院校的渠道已开始逐步打通。这说明,现在社会成员向上升迁的途径不是很窄,而且是越来越宽,越来越多了,这同样动摇着“应试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

再者,目前中国人的职业的水平变换和地域迁移已有了极大可能(从农村到城市,从内地向沿海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便可证明),这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不可想象的。这表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发展机会远非科举时代的封建社会所能比拟。中国社会目前的水平流动和上下流动的渠道已逐步畅通,“应试教育”的某些社会基础正在逐步削弱。

应当承认,“应试教育”的某些社会基础虽已大大削弱,但只要社会还在为高学历者提供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应试教育”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条件就不可能消除,我们只能尽量减缓它们的负面影响。目前,导致“应试教育”的压力还不小(见表2):

表(2)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单位:万人)

年份	初中毕业生数	高中招生数	升学率%
1980	964.8	442.8	45.9
1985	998.3	416.2	41.7
1990	1109.1	450.4	40.6
1995	1244.3	601.6	48.3
1996	1297.8	633.36	48.8

资料来源:同表(1)

从表(2)可看出,从1980年至1996年间,初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一直徘徊在40%至50%之间。这说明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进不了高中而与高校无缘,而他们也有强烈的升迁动机。这就加剧了初中毕业生升高中的压力,这是诱发小学、初中“应试教育”的重要因素。1995年我国高等学校的毛入学率为7.3%;我国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同龄人中上大学的比例只有5%。我国的高等教育还处于“尖

子教育阶段”，在近20~30年，只有少数人才能上大学的状况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总之，工农、城乡、脑体的三大差别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地位的差别是造成“应试教育”的主要根源。减缓“应试教育”的影响力是我们国家的长期任务。除社会机制和社会条件外，文化传统也是造成“应试教育”的不可忽略的因素，这一因素的影响在某些东方国家，如日本、新加坡等国特别明显。“应试教育”问题与其说是教育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文化问题，应当进行社会、文化、

教育的综合治理。（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注释：

①董泽芳编著，《教育社会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第112页。

②《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1996年）》，国家教委计划建设司，1997年1月。

参考资料：

刘海峰：《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台湾，文津出版社，民1980年版。

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

素质教育的由来及其前瞻

谢作栩（博士生 副教授）

一、素质教育运动的由来

70年代末，中国迈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轨道，百废待兴的教育领域得到了中央的重视。1977年，邓小平同志作了振兴教育事业的重要讲话，“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要发展科技和教育。……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①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下，我国高校于1977年恢复了全国统一考试招生制度。从1977年至1996年间，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规模扩大了4倍，仅1996年一年的大学毕业生数就超过了文革前17年高校毕业生数的总和。

然而，在向科技进军的号角中，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以“英才教育”为主导。进初中、高中和大学学习均要参加“升学考试”，层层选优。各省、地、县（市）还专为此设立了一批重点中、小学。多数中学还编了快、慢班，进行分班教学。由于现行书面考试技术的局限，只能侧重于知识测验。至使中小学

教育产生重智育，轻德育、体育；重知识，轻能力等偏向。另外，由于独生子女一代的成长，家长望子成龙，社会用人部门偏重学历，舆论宣传偏爱英才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使“升学考试”这个选优制度的负面影响恶性膨胀，并畸变为左右教学的目的，从而异化了教育，也异化了受教育者，使之成为片面发展的人。

1984年，党中央领导同志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特点出发，指出“要现代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素质。”^②翌年，中央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此后，教育论坛关于人才“素质”的讨论渐渐热起来，并在讨论中衍生出“素质教育”这一术语以代表那“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目的的教育”的命题。同时，湖南汨罗县等地区也实施了面向全体应受教育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改革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升学考试”的负面影响。1990年，上海师大燕国材教授撰文肯定了“把升学考试或就业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教改新气象。^③素质教育渐渐被人们当作抵御“应试教育”风气的武器而广加讨论。

1994年，江泽民主席在全国教育工作会